



情感结构视域下文化共情的生成因素与 共情能力提升策略*

江 凌

摘 要:文化是社会交往的精神纽带,文化共情作为人类文明交往的情感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内在而持久的动能。文化共情结构的作用机制包括社会意识对文化共情环境的作用、符号表达对文化共情媒介的作用、个体经历对文化共情经验的作用。文化共情的生成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变化与媒介推送、意识形态与价值选择、文化亲近度、文化差异性、文化符号表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行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生成文化共情,并产生相应的共情行为。提升文化共情能力的主要策略包括:充分发挥媒介平台的正向共情引导作用、鼓励跨文化交流、创新文化符号的共情表达、提升民众的文化知识素养与社会理性、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行动等。

关键词:情感结构;文化共情;生成因素;共情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02;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4-0057-07

当今国际形势充满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尽管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和平、发展、稳定、交流、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景。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与蔓延,让世界各国人民意识到团结一心、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必要性。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全球福祉的实现,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认知和共通情感,文化是实现这种理性共识和情感共情的纽带。文化作为一种有情感、有温度的柔性力量,能够建构出一种稳定的共情结构,基于人类的共通情感尤其是在全球性公共灾难面前的共情力,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在共情状态下的亲社会行为,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价值和行为深入人心。本文在梳

理界定共情、文化共情概念的基础上,基于情感结构理论分析文化共情结构及其作用机制,探讨文化共情的生成机制和影响因素,以及文化共情实践,分析提升文化共情能力的主要策略。

一、文化共情与情感结构理论

共情又可译为同理心,最初用以形容理解他人主观经验的能力,后来意指进入他人的情感状态,感同身受地去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①。这一概念的提出很快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共情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并扩展到更多领域。国内外学者对于共情的概念、本质、分类、特征、生成过程等方面的讨论,成果丰富。共情是在感知、认识和理解他人所思、所想、所为的基础上,

收稿日期:2022-05-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与数字时代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实现途径研究”(18ZDA31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江凌,男,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化产业管理系副主任(上海 200240),主要从事文化经济、新闻与传媒等研究。

感同身受地同情和理解他人,并将这种情感映射于自身,进一步产生具体的实际援助行动。

在国内学者的早期研究中,文化共情多被称为文化移情。从跨文化层面来看,文化共情是“跨文化交际中连接主体与客体的语言,是交际主体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在交际过程中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俗套和框架模式,摆脱自身文化的约束,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如实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1]。从该定义来看,文化移情是处于不同文化语境的人们在交流中,既要转换文化立场,做到“入乡随俗”,也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感受异质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文化移情是“为了保证不同文化之间顺利沟通而进行的一种心理体验、感情位移和认知转换”^[2],而承认差异、认识自我、悬置自我、体验对方、准备移情、重建自我,则是实现文化移情必经的基本步骤。

文化共情与文化移情的含义近乎相同,但放在具体的汉语语境中还是有细微的差别。文化共情不仅是异质文化群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连接文化和情感的桥梁及纽带,更是具有相似甚至相同文化背景的民众或群体进行文化沟通与交流的情感共通心理和外在的行为方式。文化移情的前提条件是异质文化,而文化共情不仅存在于异质文化之间,更存在于相同或相似文化背景的群体和个体之间。有学者提出了群际接触说,并基于实证研究指出群际接触对于文化共情的正面推动作用。群际接触通过跨越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文化界限,包括语言文字、宗教、民间信仰、民族、风俗习惯等,有效改善群际关系。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文化符号、社会制度、民俗风情等,导致了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而文化共情则在不同文化之间和同一文化之中的不同阶层、群体、个体之间架起情感沟通与交流的桥梁,缓解因文化差异性、群体或个体的情感偏向带来的文化隔膜而导致的矛盾、冲突与暴力等问题。

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把“感觉结构”作为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感觉结构”一词出现在他1954年出版的《电影序言》中。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感觉结构”一词在特定语境尤其

是戏剧、艺术语境中比观念或一般生活经验的描述更准确,他用“感觉结构”描述某一特定时期艺术家与观众共同拥有的一种“经验”,这显示出他们对生活或时代经验的整体感受。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雷蒙德·威廉斯将感觉结构之说扩展至文化领域,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一种方式,“我们有可能获得对某种更内在的共同因素的感觉,它既不是社会性格也不是文化模式,而是这些品质或模式赖以存续的实际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3]56-57},也是共同体中沟通、传播和代际传承的依靠,不同代际以不同的方式感受生活,塑造出新的感觉结构。

雷蒙德·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对感觉结构进行了专门论述,使该理论逐渐成熟。回到情感结构理论本身,雷蒙德·威廉斯定义的文化概念是把握情感结构意蕴的着力点,他从理想、文献与社会三个层面界定“文化”,“理想的文化”指人类的某种尽善尽美的状态或过程,以某种绝对真理或价值状态存在;“文献的文化”强调其“记录”功能,指某种文化的现存文本与实践;“社会的文化”指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或表达^②。雷蒙德·威廉斯指出,文化在某个特定时期是一种稳定而明确的结构性存在,他用“情感结构”的概念对这种存在进行描述,文化研究将这三方面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探究其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以将情感结构视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在情感结构中,深层的文化共通性与实际生活中的细微感觉都得以表现。

二、文化共情结构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雷蒙德·威廉斯“情感结构”概念和文化理论视角,可将现实生活中文化建构情感的实际分为社会意识、文化符号与个人经验三方面,个人情感来自这三方面的共同影响。其中,理想的社会意识作为潜在的、群体共同的思想观念,为情感的生发铺垫社会宏观背景,个体情感首先受到社会意识的鼓舞或抑制,也因此受

到国家、民族以及时代的影响。作为意义的生产者,文献或作品的符号传播和交换同样促进情感生成,使情感既具有社会性又带有个人倾向性。具体或特定社会生活方式中的个体经验则具有主体性意识,个人生活经历与体验的具体化和流动性让情感存在明显个体差异性。这三方面作为整体的“文化情感结构”,成为包括共情在内的情感生成逻辑的分析框架,让文化建构中的情感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为解释个体情感的生成和变化留出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的情感结构可被视为融社会意识、文化符号与个体经验为一体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作为连接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纽带,既包含了外在的、共有的稳定结构,又具有内在的、流动的经验意识,以一个复杂而矛盾的综合体形式对个人在社会中的情感生成发挥作用。

文化情感结构作为建构情感的文化综合体,作用于文化共情的生产和传播,在文化共情生产实践中,文化情感结构从三个层面作用于文化共情。首先,作为社会意识的思想观念,时代、传统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等作用于个人的层面,是文化共情产生的群体背景,宏观塑造了个体共情。其次,文化符号意义承载并作为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交换,作用于文化共情。最后,个人生活阅历、群际接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文化共情更具主观色彩。社会群体意识所具有的结构稳定性和文化交流的不确定性、个人经验的主观性结合,构成文化情感结构的整体,文化在这种整体结构中生产和建构共情。在此过程中,文化共情结构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社会意识作用于文化共情环境。雷蒙德·威廉斯从文化的社会性角度,将文化分析的使命描述为“在生活和劳动中发现并描述那些或构成了某种永恒的秩序,或对人类社会普遍状况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真理和价值”^{[4]54},启发我们从社会意识层面探索文化共情结构的作用机制。文化具化为某种“真理和价值”,以社会意识的内涵和表征作用于文化共情生成机制的环境因素中,这里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不同

国家和民族所秉持的历史传统观念与价值选择。情感结构作为共同体生活的基础,被广泛而深入地拥有,但其形成并不是通过“习得”,而是源于传统与当下的生活实践^⑧。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民众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不同,在价值观念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在现代西方社会,民众将个人自治视为自由的本质追求,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孤岛”。东方儒家哲学则将人视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强调集体意识和社会秩序,认为人生的理想是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中实现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差别使东西方国家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体系中形成了不同的情感倾向和文化共情环境。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暴发后我国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得到了充分彰显,人民群众互帮互助、众志成城的情景,既是对中华文化“仁爱”思想的继承发扬,亦是文化共情的直接表征。而美国民众则强调追求所谓个人自由,漠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在疫情灾难面前难以产生共情的情感和行为。由此可见,一个群体或地区特殊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是作用于文化共情的重要因素,它在宏观社会层面建构文化和个体、社会共情。

二是符号表达作用于文化共情媒介。文化共情需要借助一定物质的、艺术的媒介或网络媒介进行推动,这些媒介平台中以文字、图片、图像、音视频等符号创造的文化共情景观,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既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将情感结构大致理解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其内涵包括人类共同体当下生活实践中有意义的、活的结果,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艺术加以表达。以网络媒介平台新型的文化符号表达为例,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网络媒介将人与人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超越时空的限制,通过文字、图像、声音将受众带到任意文化场景中。借助互联网技术工具和平台载体,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产品。借助数字技术,人们能够以更加多样的形式享受文化服务。网络时代,全球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增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互相接触和对异域文化的了解,文化

接触度普遍提高,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共情作用更加普遍化和常态化。比如,李子柒通过田园化、中国风的原生态土味视频吸引数百万海外粉丝,影响力堪比美国权威媒体CNN,“一个热爱生活的美丽女子”^④成为海外公众对其视频作品形象的认知。个体化的叙事角度、日常生活的美好图景、传统的诗意栖居风格、田园山水的美丽画卷、踏实勤恳的农耕劳作、丰富多样的美食制作、意义非凡的非遗传承,李子柒视频作品符号表达的是人类普遍向往和共享的生活追求和价值选择。以视频表达形式为载体,通过网络平台共享,中国的原生态栖居文化与海外公众建立了情感共通的连接点,形成文化共情和原生态栖居的文化认同。

移民和旅游带来的全球性人口流动,使得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不断更新知识经验,增进对他者文化的接触、认知与认同。地域文化遗产、地方文学作品成为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纽带,助推文化共情形成于异域文化之间。而当重大公共性灾难事件发生时,文化共情能够打破时空距离和文化区隔,超越文化隔阂的传统界限,扩散并影响到无数个体。如今,文物古迹遭到毁坏的事件时有发生,2019年4月巴黎圣母院遭受火灾引发了普遍关注与讨论,这种文化共情的生发很大程度上既受到雨果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这一文学作品的影响,又因为巴黎圣母院本身就是著名的国际旅游景点,成为联系当地人与世界各地游客情感的纽带。当灾难发生后,作为符号表达的文化媒介进一步建构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共情图景。

三是个体经历作用于文化共情经验。雷蒙德·威廉斯关于文化的社会性定义对确立英国文化主义学派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在文化的社会性语境中,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⑤,即为文化。这是从人类学视角界定文化。每个人都处于特定的生活方式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的个体生活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个体对世界的认知、对文化的感知,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共情经验。而越是具有相同体验的个体,他们之间的情感共通性和认同感就越强,在情感共通与认同驱使下

形成共情的动力就越强。媒体报道中对个体悲剧及其细节信息的传递,更容易引发共情的原因也在于此。共情的关键在于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体会他者的情感和境遇,而相似的经历、经验和细节描写更容易将人们带入其中,产生强烈的共情。在公共灾难事件报道中,关注具体的细节、贴近共通的情感体验,更能激发受众的共情体验和行动。

三、文化共情的主要生成因素

文化共情的生成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生成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变化与媒介推送、意识形态与价值选择、文化亲近度、文化差异性、文化符号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行动等,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共通、相互推动,综合生成文化共情,并产生相应的共情行为。

一是社会环境变化与媒介推送。社会意识能够作用于社会环境,进而建构文化共情机制,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文化共情生成的重要因素。与和平稳定时期相比,当重大公共性灾难事件出现或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情况下,社会民众的心理会因为灾难或社会形势的复杂多变性、冲击性和不稳定性而产生不同的变化,他们对这些文化与社会事件的感知体验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一般而言,重大灾难事件的严重等级越高,受灾范围越广,灾情越严重,影响力就越大,相应的媒体报道也会越多。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平台信息传播量增长,社会民众通过事件报道和媒体推送,接触和认知重大突发性事件信息,感知受灾地区民众的物质和心理需求的可能性越大,也就越容易催生出文化共情心理,并进行捐资救助行动。

二是意识形态与价值选择。国家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决定社会民众的主流价值观。价值观念成为文化内涵与底蕴的集中体现,形成了衡量“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体系,支配着社会民众的信念、思维、态度和行为。相同或相近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能够有效提升社会或群体内部个体的文化共情能力,但不同主体间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念,则可能成为

生成文化共情的绊脚石。

三是文化亲密度。文化共情的生成具有主观能动性。任何文化的相似或相近特征,都有可能触发社会个体或群体的某种“共情机关”,引发意想不到的文化共情效果。这种文化的亲密度可能来自历史渊源、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地理位置,甚至个体与群体的相似经验等,文化相似性越高,越容易产生文化共情。例如,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文化之间的渊源更容易助推生成文化共情。新冠疫情暴发后,日本在捐赠物资包装箱上贴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引发了两国民众的文化共情反应。此后,日本面临严重的疫情考验,中国同样不忘在驰援物资的包装箱上贴有美好的寄语,从“青山一道,同担风雨”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寄托了特殊时期两国人民的美好希冀,成为以文化相似性推动文化共情生成的典型案例。

四是文化差异性。文化差异是客观而普遍的存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语言文字、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体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都是文化差异性的表征。文化距离是文化共情生成与运行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文化差异越大,文化的认知距离就越大,文化心理距离越大,文化交流与贸易过程中的文化折扣现象越明显。因为差异性较大的他者文化,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容易出现信息减损、失真甚至扭曲等问题。文化差异性越大,文化共情生成的阻力越大。文化的权力距离指社会成员对于其所处社会或组织中权力不平等分配问题的接受程度,不同国家、民族的民众在权力距离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低权力距离国家与高权力距离国家各有裨益,但在文化共情方面却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权力距离导致的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化距离与隔阂,抑制文化共情生成。

五是文化符号表达。文化符号蕴含着共情的价值和意义,文化共情的生成和力度受不同文化符号表达的影响。文化符号的共情价值越大,文化共情力越高。共情的文化符号表达是生成文化共情的助推剂,不同的文化符号表达不同的

共情效力。文化符号的巧妙表达能最大程度拉近共情主体间的情感距离,让文化更有温度。比如,疫情援助中“风月同天”给身陷困境的民众带来了独特的共情感,这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表达具有强大共情力,从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民众刷屏式的关注,便可窥见一斑。

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行动是当今国际社会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生成文化共情的重要影响因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了解和体悟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符号、民族风情和文化风俗,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越强烈,越容易推动生成文化共情,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共情也是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行动的驱动因素。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各种国际会议、领导人会晤和高层交流场合,主张我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坚定立场。面对全球疫情蔓延的严峻形势,习近平主席在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时指出:“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我们付出巨大努力,有效阻止了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中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态度,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开展合作。”^[5]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的表现无疑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行动的最好诠释,也体现了最真实的文化共情。

四、提升文化共情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局势复杂多变,非共情因素越来越多,甚至会受到丛林法则、霸权竞争、战争冲突等因素的影响。西方一些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差异形成的文化区隔与误解,抑制了

文化共情的生成。为此,亟须提升全球文化共情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是强化媒介平台正向带动作用,提升民众媒介素养。在全球媒体尤其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各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是传递文化共情的主力军,理应坚守底线、守望社会、引导正向共情舆论。在纷繁复杂、信息剩余、真假交织的网络媒体时代,各类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需要遵循客观、公正、理性的原则,揭示事实真相,做有温度、有共情力的事实信息发布与传播,不能利用自身的媒介平台特权操控民众的非理性情感。为此,一方面,应规范媒介环境,发挥媒体的正向共情带动作用,尽量进行理性共情表达,避免非理性的情感宣泄。另一方面,强化媒体内容审核机制和平台辟谣机制,尽可能切断虚假不实的信息和谣言的传播渠道,让文化共情立足于真实客观的信息内容,避免虚假共情。同时,应强化民众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是“人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6],生活在网络媒体信息洪流之中的民众,应以主流媒体为主要信息接收渠道,不要轻易相信非主流媒体发布的让人难辨真伪的信息内容。要增强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理性的思考,要拥有自我意识的真实情感,发挥文化共情的积极作用。

二是鼓励跨文化交流,注重文化符号的共情表达。当前,在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中,文化现代化建设被放置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增强文化自信,需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鼓励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正是助推世界各国与中国之间生成文化共情式交流、形成文化共情效应的基础。中华文化跨文化交流与传播,需要更加丰富的内容与更加多元的载体,尤其需要积极推动武术、京剧、书法、民俗节日、杂技、龙舟等中华文化及其符号的创新性表达,以其他国家民众容易接受且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符号,彰显中华文化的温度、特色和价值,并利用文字、图像、音视频等

各种表达形式,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立体化传播,发挥文化的共情效应。比如,近些年逐渐兴起的与当下社会发展和科技繁荣相匹配的文化表达形式和艺术创作,已形成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文化语言和符号表达方式,在青年一代中所向披靡,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语言不通而导致的文化折扣问题。例如,李子柒的视频传递的生活态度和自然生活方式,激励了海外网友更加热爱生活,并爱上中国以及中华文化。

三是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培育社会理性。在大灾大难面前,社会上有时会出现缺乏正向文化共情的现象,与民众在科学文化知识、文明水平和道德素养方面的匮乏不无关系。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科学的防疫知识与防疫措施,坚持冷静理性的思考与同理心,应该成为民众的基本素养与能力。特别是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考验之后,全面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和文明道德水平势在必行。文化是有温度的,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善意、理解与共情并非无处安放,即便在刻不容缓的援助中,也不妨碍书写一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四是提升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化潮流面前,由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不同文明的异质性,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加上个别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依然盛行,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和排他性有增无减,导致人类文明交往的风险增加,信息和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多元价值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和发展利益博弈日益明显。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力图通过人类文明的平等与理性交往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境界。同时,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疾病、战乱、冲突时内心充满不安全感 and 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惧、焦虑、愤懑、抱怨等情绪,甚至演化为攻击他人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种种过激行为。特别是疫情期间,个别不尊重客观现实、非理性情感表达等现象,更加彰显出提升共同体意识,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民众之间共情能力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结 语

在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全球化问题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增强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全球民众的心理共情和文化共情能力,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命题。基于“共情”“文化共情”“情感结构”等基本概念界定及其内涵分析,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关于文化理想性、记录性、社会性的三层定义,可以构建文化共情结构框架,分析文化情感结构的作用机制。与文化的三层定义相对应,文化共情结构的作用机制表现为:社会意识对文化共情环境的作用、符号表达对文化共情媒介的作用、个体经历对文化共情经验的作用。结合全球范围内文化共情的实践案例,尤其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共情案例,可以总结出文化共情的生成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环境变化、意识形态与价值选择、文化亲密度、文化差异性、文化符号表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行动等方面。培育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民众的价值理念和共情宣言,更是全球人民的希冀,世界各国需要增进跨文化交流,增强文化共情能力,以文化共情的力量促进各国人民团

结一心、同舟共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注释

①参见杰里米·里夫金:《同理心文明——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全球意识》,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②参见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5页。③参见李丽:《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析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④参见陆佳怡、宋志鑫:《个体叙事与情感连接:新公共外交视阈下的李子柒个案分析》,《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第3期。⑤参见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参考文献

- [1]赵桂华.跨文化交际中的移情障碍及其克服[J].学术交流,2006(3):167-169.
- [2]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能力的价值与培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17-19.
- [3]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 [4]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5]习近平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N].光明日报,2020-02-18(01).
- [6]卜卫.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J].现代传播,1997(1):29-33.

Generating Factors and Strategies to Improve Cultural Empathy 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Structure

Jiang Ling

Abstract: The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bond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empathy, as the emotional force of human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endows us with internal and lasting power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empathy structure includes the effect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on cultural empathy environment, the effect of symbolic expression on cultural empathy media, and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on cultural empathy experience. The generating factors of cultural empathy include changes i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media promotion, ideology of thought and value selection, cultural progress,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expression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se factors interact to generate cultural empathy and produce corresponding empathic behaviors. The main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cultural empathy includ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empathy and public opinion role of media platforms, encouraging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innovating the expression of empathy with cultural symbols, improving people's cultural knowledge and social ideals, and enhancing awareness and action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etc.

Key words: emotional structure; cultural empathy; generative factors; empathy ability;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责任编辑/李 齐]